

关系。

目前固始的国土面积不足3000平方公里，但人口高达160多万，名列河南省第一。固始蒋集镇国土面积76平方公里，目前人口近7万，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921人，竟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一现象当与光州固始自古人口便极为密集的历史背景相关。

### 固始先民南迁之两大动因

首先，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长期处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制高点，长期是中华民族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例如，孔、孟、老、庄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先秦哲学家，他们的故里或祖籍多在以今河南商丘为国都的宋国境内或宋之邻境。固始先民具有中原文化先进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在迁移到荒蛮之地后，不仅能够迅速立足，而且有能力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优化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成功地向海外发展。

其次，人口压力是固始先民因循南迁的直接原因。在宗族关系紧密、注重人丁兴旺的中国古代社会，达官士族和百姓流民不断涌入光州固始，加之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导致固始人口基数持续激增，从而在客观上迫使固始先民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家园。而闽南地区耕地虽少，但人口密度也甚小，加之气候条件优越，很适合固始先民前去拓展。宋代以后，福建“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所以固始人又开始聚族向“土旷人稀”（4.5人/平方公里）的潮汕地区、进而跨海向台湾地区迁移。

寝丘与固始，本是两个不同时期却有某些关联的历史地名，因涉及固始是否从淮北侨置，也涉及楚相孙叔敖故里问题，从晋代争议到现在，尚无一个相对权威的定论。笔者综合近年资料整理情况，草作分析，并希望与方家商榷。

固始是否从淮北侨置，寝丘是否只是一地专名，在三代及秦汉时期尚无争议。汝南之寝丘与淮南之寝丘，史籍各自表述。到晋代，杜预注《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伐郑“沈尹将中军”时首提：“沈或作寝，寝县也。今汝阴固始县。”把“沈”与“寝”释作同地之名，并注明曰“今汝阴固始县”，于是“沈”即“寝”，即“今汝阴固始县”，与古寝丘、淮南固始县是否关联，是否侨置，两种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各有所凭。

寝丘地名，见于古籍者有两地，系同名而异地：一为同“沈”之“寝”，地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秦置寝县；一为潘乡寝丘邑之“寝”，地在今河南固始城关，古潘国地，楚相孙叔敖家

# 寝丘与固始

乡，秦置寝县。两地虽然同名，发生于两地的历史事件却各不相同，可见寝丘并非专名。沈丘之寝，楚时属于沈县地；潘乡之寝，楚时属于期思县地，而且归楚时间有先后，期思设县在前，沈置县在后。古人因信息不灵、资料不多，故多将二者混同为一地，然后乱作史证。实际上，孙叔敖子侨受封之地，应为潘地之寝丘，而非淮北汝南之寝丘，下文将有详证。

固始地亦然。历史上淮南淮北都有过固始县：一为淮淮阳国固始县，《汉书·地理志汇释》淮阳国固始：“[颜注]师古曰：本名浸丘，楚令尹孙叔敖所封之地。[补注]先谦曰：据《高纪》晋灼曰：固陵即固始，此班志之固始也，其世祖更名之固始，自属汝南浸。周寿昌云：浸下注引应劭云：孙叔敖子所邑之浸丘是也。”《汉书·地理志汇释》寝县下所注亦略同。即固始亦有二：一是由固陵县改名固始，西汉属淮阳国，地在今河南太康县南，东汉废入阳夏县，与所有寝丘无关，颜注错误；二是由浸县改称的固始侯国，东汉大司空李通封邑。

现在争议的焦点即侯国固始，因它的分封还有一桩历史佳话。《汉书·地理志汇

释》“淮阳国固始”条下：“[补注]（汝南固始）县，故浸也，浸丘在南，故以藉丘以名县矣。城北又有孙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有关孙叔敖子受邑，见宋洪适《隶释》收录的东汉延熹三年（160年）五月立于期思县城孙叔敖庙前的楚相孙叔敖庙碑（碑阳）：“……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该碑阴亦云“相君三子，长子即封食邑固始”。明嘉靖《固始县志》卷二：“固始县，古潘国。”清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二“建置”：“固始，周蒋国……楚灭之，改为期思，封其大夫复遂为期思公，又分其地封孙叔敖之子，是为寝丘。”同志卷八“城池”：“固始在西汉为期思，为寝。寝即今县城。”

由此可见，李通因慕孙叔敖以土寝薄取而为封，光武嘉之，更名固始。而让李通所仰慕的孙叔敖受封之寝是古潘国之地，即今固始县城，位于今固始县城中部北部的潘国故城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此推论，孙

氏所邑之寝应是淮南固始之寝，李通慕孙氏而受封，也当是固始之寝，故言孙氏子受邑，李通慕而受封之寝丘、之固始地在淮北是讲不通的，难道淮北古寝丘之上也有个潘国故城遗址、蒋国故地？

孙叔敖活动的时间与受封时间亦可说明淮南之寝与淮北之寝各自存在，淮北之寝与孙氏封邑无关。孙叔敖死于公元前593年，楚庄王死于公元前591年，庄王封孙叔敖子于寝丘之事当发生在公元前593~前591年之间，但此时沈、项等淮北之地尚不属于楚的势力范围内，《左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可以查证；而此时固始历史域地的蒋、蓼、潘等古国已被楚灭，并建有期思等县，楚庄王不可能把属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功臣，故孙氏所封之寝只能在淮南固始。同时，孙叔敖的家乡和活动范围，在他做令尹前也多在今固始历史域地内。《吕氏春秋·不苟论·赞能》记载沈尹筮向楚庄王推荐孙叔敖时就说：“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孙叔敖为楚期思县潘乡人，即今固始县城关人。《荀子·非相》说：“楚之孙叔敖，期思鄙人也。”杨注：杜元凯云“鄙人，郊野之人也”。《光州志·期思景贤义学记》引《史记·正义》：“寝丘，土浸薄也。潘即寝，义取诸此。”“潘为孙叔敖桑梓汤沐之乡。”孙氏在做令尹前，在家乡带领乡亲修建了中国水利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从而使他名重朝野，故《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这个工程遗迹至今还分布于固始中、

东部平原地区。对此，武汉大学石泉教授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固始县城特殊的地形，见高诱所注的《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高诱注“寝丘”云：“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后有庄丘，名丑。”《列子·说符》、《吕氏春秋·异宝》所载，亦与此相似。清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八“城池”、顺治《固始县志》卷三“城池”都说：（固始）城创于汉高帝，垣围六里，门辟三关。其县城一般至少有四门四关，而固始城只有三门三关，南门外因“前有垢谷”无法立关设市，至今亦然，故固始俗言“固始县无南关”。固始县城建于古寝丘之上，旧城东门上方嵌一石匾，上书“古寝丘”三字，1958年《固始县志》（稿本）对此有过记载，因当时东城门还未拆除，人所共见。

至于《水经注·颍水》所记淮北之寝丘、固始，临泉、沈丘等县地方志所列之寝丘、固始，或许是一种地名巧合，或因县名重复而误记，都很正常，可以继续研讨。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研究汉代政区地理时，列举了很多名同而地异的县，最多时一名而六地，现在这种现象应不多见。

这里还要纠正一下固始县旧志中关于东汉时固始县属淮阳国的说法。西汉时，淮阳国治下有固始县，由秦固陵县所改，东汉省入阳夏县。东汉时，因朝廷不断弱化诸王实力，诸王封地也比西汉时为小。东汉淮阳国，是刘昞封地，是从汝南郡中

析出新安、西华二县而置。固始也是汝南郡 37 县之一，但不属淮阳国，只属汝南郡，可能是前人整理旧志时把两汉之淮阳国固始弄混了，才有此说。估计固始侨置说也与这种地名混同有关。

我对此的几点认识：

一、侨置之说未见于正史明载。《元和郡县图志》曰：“光州固始县，东汉封蓼侯之地，春秋时蓼国，楚并之，今县是也。宋明帝失淮北地，于此侨立新蔡郡，领固始一县。”这说得很明确，于固始原址上“侨立”的是新蔡郡，而不是固始县，是新侨立的新蔡郡领固始原址的固始县。固始旧志历史沿革连贯而明确，只是在南朝时短时期向南、西侨置过，而未见从淮北南迁的记载。

二、古寝丘，古潘国，孙叔敖子受邑，李通慕而受封，在固始历史地域上有序展示，古今史载明确无误。有些古人在注释过程中，强行把孙氏封邑与李通封地拉到淮北之寝，显然与史实不符，更与大历史背景下的楚国地域不合。古人注书，因资料、见解等原因产生这样那样的曲解、误注，都很正常，我们不能责备先人，只能尽力还历史于相对真实。如《水经注》关于“蓼国”（即固始东蓼）地域记述就与六安南部的“舒蓼”混同，现在应当纠正。

三、东汉延熹三年，期思、固始两县长官为孙叔敖建庙立碑，以后此碑由期思镇移立于固始县城文庙前，1960 年前后，县文庙改建会场后不知下落，《隶释》与《金石录》都收录有碑文，清末固始举人万自逸在《固始县地理沿革考》中记载：“孙叔敖碑为延熹三年固始令段光立，在期思出土。”现在有人认为孙氏碑文是后来假造，此说只能是假设。

四、沈丘之寝与潘乡之寝都应存在。从前文所列史料，位于颍水流域的寝丘与位于决水（今史河）流域的寝丘应同时存在，存在原因应与西周中期淮夷部落受到周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迁居于淮河以南的历史事件有关，地名随人是历史常见现象，顾颉刚、钱穆等对此都有论述，此处不再列举。但由于“人为”巧合又把固始与古寝丘联系了起来，当今固始与淮阳国之固始，还有“颍水流域之固始”有无历史渊源，成为一桩历史公案。这个中间的结合点应是孙叔敖子封邑与李通封地，还应与古潘国、古蒋国有历史的地缘关系。只有把这些历史的联结点有机联系起来，才能勾画出一幅合于史实的寝丘·固始历史图画。